

蕉風文叢



五里四之花

姚拓著

蕉风文丛：

五里凹之花

作者：姚拓

出版者：蕉风月刊

BULANAN CHAO FOON

10, Jalan 217, 46050 Petaling Jaya, Selangor.

Tel: 03-7912455, 7912551.

印刷者：马来亚印务有限公司

MALAYA PUBLISHING & PRINTING CO. SDN. BHD.

10, Jalan 217, 46050 Petaling Jaya, Selangor.

总经销：马来亚图书公司

MALAYA BOOK CO.,

22-24, Jalan Bukit Bintang, 55100 Kuala Lumpur.

怡和书局

IPOH BOOK CO.,

75, Jalan Market, 30000 Ipoh, Perak.

友联书局

UNION BOOK CO.,

Blk 231, Bain Street # 03-01,

Bras Basah Complex, Singapore 0718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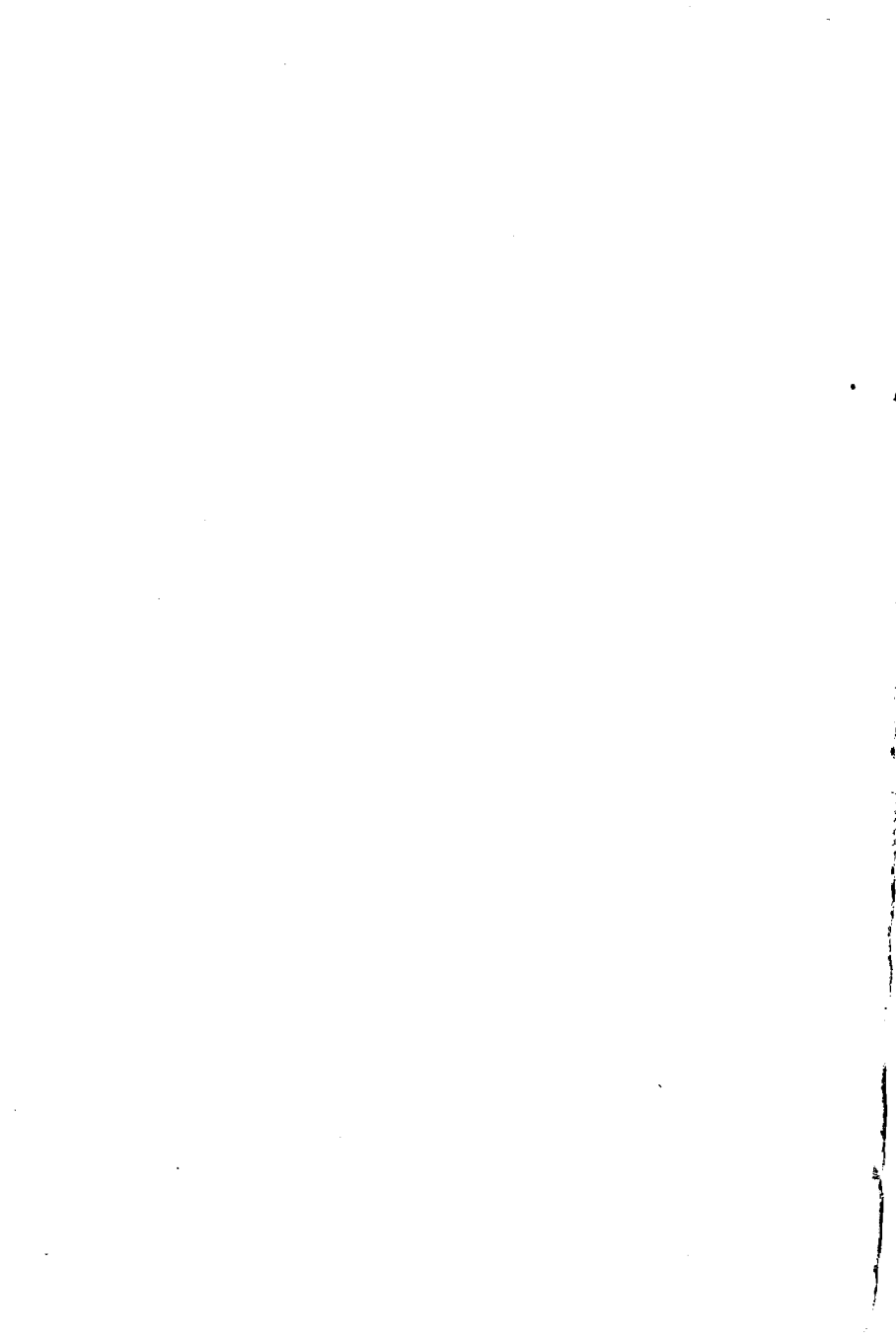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每册马币 四元五角

(如有缺页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)

五里凹之花

姚拓著

蕉风文丛



目 录

五里凹之花·····	7
黑而亮的眼睛·····	53
奇迹·····	109



再版序言

《五里凹之花》这本中篇小说，1965年由香港正文出版社出版，原书共有三篇小说，计《五里凹之花》，《黑而亮的眼睛》及《职业病》。1981年出版《姚拓小说选》时，因《职业病》系以马来西亚为背景，故转录于《姚拓小说选》中。

《五里凹之花》第二次版本在1992年印刷，因《姚拓小说选》的《奇迹》与《五》、《黑》同一背景，故将《奇迹》移在本书再版。

以上三篇故事，都是尘封已久的陈年旧事，本不值再版，但有时深夜自思，我出生以及我生存的这个年代，实在是亘古少有的年代。读我的小说，也许能够联想到一点点乱世儿女的生活面貌。但愿我们的后代子孙，不重蹈前人的覆辙！

1992年 姚拓

五里凹之花

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我在昆明读书。那时候，中日战争正打得难解难分，昆明虽然因为驻有飞虎队的战斗机，日本的飞机不敢前来空袭，但因为战争拖得太久了，每个人都存着过一天算一天的心理。学校的教授们一上课，满肚子都是牢骚，不是骂政府无能，就是骂官吏贪污，再不然就诅咒奸商们比汉奸还可恶，使得他们的薪金发下来时已经成了废纸。学生们对这种牢骚已经听厌，教授们在台上骂得口沫横飞，我们却伏在桌子上呼呼睡觉，彼此互不干涉。

说良心话，我对这种学生生活，早已烦厌透顶。在这个年头内既然无心读书，又读不了什么书，成天呆在学校内岂不是活活受罪。但那时候，读书是完全免费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从沦陷区出来的学生，政府供给一切费用，连吃饭穿衣都包括在内。为了保存这张饭票，又不得不懒洋洋地“读”下去。

正当这时，政府忽然发动十万青年从军运动，用来挽救最危困的战争局面。政府文告中说，退役后依然可以回来读完我们的学分，而且特别优待。自从抗战以来，我一直被关在学校内；现在既然有这样的机会，纵然

前线上处处都是炸弹与死尸，我也要去开一开眼界的。何况我学的是文学，总觉得真实的生活如不丰富，说什么也写不出好的小说来的。

学校贴出响应从军运动布告的第二天，我就去报了名。报名室内挤得满满都是人，我费了好大气力挤到里面时，忽然看见我同班的同学张希文竟然也去报名从军。别的人从军我不奇怪，但张希文这个以追求女同学出名的风流博士，平时极力诋毁战争，怎么这时改变了主意？不等我问他，他就咧开满嘴的黄牙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：

“小唐，你不用惊奇，咱老张也知道爱国！”说完就嘻嘻地笑了起来。

我说：“门缝里瞧吕洞宾，真是看扁了神仙——假如你也从军，宿舍内的恋爱学有谁去讲授呢！”

平时在宿舍，恋爱故事讲得最多而又最大胆的，莫过于张希文。每逢他坐在床沿上讲他的恋爱学时，床前床后，甚至两层床的床顶上都挤满了“学生”，比我们坐在课堂听老教授们讲学时劲得多。

报完名，他和我一同挤了出来。回宿舍的路上，我问他既然报名从军，怎么能舍得了成天挂在他口上的女朋友黑牡丹。黑牡丹也是我们的同学，比我们低一年。人长得挺不错的，只是稍微有点黑，但非常有风姿；张希文出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从别人手中抢了过来——他每晚恋爱学的主题大多讲的是她，差不多全校的人，都知道他和她的故事。

“别提了，”张希文耸耸肩说，“就是为了她，我才下决心从军！”

“这么说来，黑牡丹是‘毛儿的妈’的女英雄了！”
(注)我开玩笑地说。

“英雄个狗屁！”博士居然也会动怒，“我们已经一刀两断！”

我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。原来他从军是为了失恋。

我说：“失恋，也犯不着上前线拼命！你一向不是最反对战争的吗？”

“嘻嘻，”他仍然嬉皮笑脸地，“到前线拼什么命？我告诉你，”他压低了声音，生怕身边过往的同学听到似地，“咱们在学校学的英文有用处了。我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，当翻译官比什么都舒服——而且，有机会到苗子窝里走走也好！”

其实，从军对于我，只是平淡呆板生活中一种反动与好奇，并不是基于什么爱国心肠，如今听说当翻译官是件舒服的事情，我倒被他说得心动了。

第三天，我和希文背着我们最简单的行囊到指定的地点报到后，负责的官长问我们愿意到降落伞部队呢，还是愿意参加去印度的远征军。事先希文已经告诉了我应对的秘诀，他向那位老粗负责官长大吹了一番，说我们两个人的英文如何是全校数一数二，好像不能做个翻译官，简直是国家的一种损失一样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两个人平步青云，军部马上发给了两

(注)当时流行的歌曲，首句是“毛儿的爹，你等等我，为妻的将你送一程。”内容系叙述毛儿的妈鼓励毛儿的爹踊跃从军。

个上尉的符号给我们，并训诫我们在外国人面前，不能丢中国人的脸等等。老实说，上尉这个官衔到底有多大，我们也不十分清楚。后来，到保山军部报到后，才知道我们这个官衔十分有用处。因为和我们每天接触的美国军人，只是一些军曹们，有的是上士，中士，连少尉都很少。我们这个假上尉比他们要高好几级呢。

×

×

×

我们被分发的地区是保山。那是滇西的一个大城市，也是前线的总司令指挥部，由昆明到保山，要坐三天的汽车。坐的汽车，是军部在昆明事先安排好的，那是一辆由商用卡车改成的军车，烧的是木炭，既非汽油，又非柴油。车上运的是军用的服装。我和张希文坐在这些软绵绵的军服上面，有如坐沙发一样的舒服，不禁相顾大笑起来。

开车的是个广东人，两位助手当然也是他的同乡。希文真是无事不通，他在车上问我：“你知道出门有三怕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第一怕是船上的船家；”他一本正经地说，“第二怕是码头上的苦力；第三怕呢，”他用手指了指车头上那几个广东佬，“就是滇缅公路上的司机。”

我当时听了他的话，还不大相信，心里想：像这部老爷车早就该当作废物了；如果是谁作了这车的司机，也是件倒霉的事情。可是，当这部老爷车加满了木炭，冒着浓烟一出昆明城以后，司机老爷就神气了起来。刚出了城门，就有几位商人模样的人们向他们招手，车子

马上煞住。我以为车子出了毛病，谁知原来是司机停下来和商人们讲带人的价钱。这时候我才知道“黄鱼”（注）并不是真的鱼，而是人。司机漫天要价，真令我大为吃惊，但那些商人们还是上了车子，不到半天，棉衣包上已经坐满了“黄鱼”。本来我以为两个人坐这部老爷车，虽然有点慢，但坐在棉衣上倒还舒服；想不到如今挤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仔细想想，希文所说的“第三怕”，实在有点道理。

现在说来，谁也不会相信，冒烟的木炭车，装满了服装，服装上坐满了“黄鱼”，竟然能爬上比金马岩高原还险陡数倍的崇山大岭。爬山时，两位助手各拿着一块大木块，紧跟在轮后，车子一爬不动，他们马上把木块塞到车轮后面，免得车子一直后退到山崖下面。车子上的人们，除了我之外，全都坦然自若。其实，路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，车轮下面的木块万一滑落，我们保准会粉身碎骨。第二天，恰好又遇落雨天，车轮上虽束着铁链，依然如滑雪一般向山下滑去，当时我吓得牙齿直打战，埋怨张希文想当翻译的鬼主意。希文哩，把头埋在被服里面，一上车来，就是睡觉，一点也不在乎。

第二天晚天到了永平。这个县城并不大，但那是伤兵站，处处都是野战医院，满街都是裹着白布的伤兵。自从中日战争以来，我见过军人和军队并不算少，但看到这么多的伤兵还是首次，心中不免有些紧张，好像已经闻到了战争的火药气味。希文却笑咪咪地告诉我：

（注）“黄鱼”是当时汽车上顺便搭客的代名词。

“你真是紧张过度，永平离保山还有一天的汽车路程。保山距离前线，走路还要三四天才到，你连地图也没看嘛！”

说得我也暗自好笑了起来。

第三天一大早就出发。开车前，司机与助手们照例要检查车上有无新搭的黄鱼，好马上收账。这时我发觉在我旁边多了一位穿着破黄军衣的人，个子又小又矮，态度悠然地在吃瓜子。司机走过来，用不纯正的普通话对他说：

“老乡，我们是靠车吃饭的，请给些车费喝茶！”

“要钱没有，要命就请拿去！”这小个子说话倒很有勇气。

司机翻了脸，大声喊叫：“下去！”

他依然嗑他的瓜子，“老子不下去，又怎么样！”

两位助手正要上前动手拉人，司机向他们白了两眼，然后径去发动引擎。原来是街上伤兵太多，那位司机怕惹事情。一出了城，车子就停了。司机和两个助手又爬到车上来，对那个小个子说：

“识相些，别让老子动手！”

“他妈的，老子就是不下去！”小个子忽地站起身来，用力一推，一个助手像鹞子翻身似地跌到车下去了。其余的两个人，猛虎扑羊般向小个子扑去。车上的人们顿时乱得一团糟，胆小的搭客，早已吓得跳下车去躲避，张希文却是个爱惹事的人，他居然爬上车头，高喊“加油，加油！”我骂他给谁加油？“小个子！”他说，“两个打一个，不合理！”

谁知这小个子真有两手，几下子竟又把另一位助手推下车去。只有司机和他一对一了。看样子司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假如把司机也推下车，跌出什么差错，岂不连我们也走不成了吗？我和希文使出全身气力，才将他们拉开。

司机气噓噓地，声称如那家伙不下车，他一辈子不开车。小个子则说：“你不开车，我就睡在这车上一辈子。”

这样，一直僵持了一个钟头。司机赌气地回城里喝茶去了。

听这个小个子讲话骂人的口音，准是我们家乡附近的人。我便对他说：

“你一定是山东曹州府的人，我们是同乡呢！”

他笑着说：“真的吗？我是曹州定陶县的，你呢？”

我告诉他我就住在曹州的街上。他马上站起来，向我敬个礼，说：“想不到咱老乡也能做官！”

我说：“刚才看你那几下散手，倒真有两下子哩！”

“岂敢岂敢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我从小跟着师父卖跌打膏药。这几个臭小子算什么！”

“你住在永平的后方医院，多么舒服，何必去前线——这车子又挤了这么多人。——”

他没等我说完，就大声诅咒着说：“妈的，这小地方有什么好玩？连鸡子都弄不到一只——还是前线好，要什么，有什么！”

希文插嘴说：“前线虽然好，但这车子不开怎去得成，你还是另外乘一部吧！”

“不成，”他说，“每一辆车子都是这样，我已经打了好几天架啦！”

这小子说话爽直，在他打架时，我已经有点喜欢他了，何况还是同乡。我回到城门口的茶铺子内，找着了那位司机，说我愿意代那位小个子出些车费，好说歹说，司机才答应回来开车。一位助手跌得头青鼻肿，另一位一拐一瘸的，瞪着眼看车上的小个子。小个子仍然悠闲地嗑他的瓜子。

车子总算开动了，但因为耽误了出发的时间，到达保山时已将近午夜十二时。下了车，天黑夜寒，我和希文茫然不知到什么地方才好。小个子却代我们提了行李，说：“跟我来，这里有旅馆。”

果然，不远处就有一家简陋的旅馆。到了旅馆，我问小个子：“老乡，你呢？”

他摊摊手：“没地方去，就和你们一起吧！”

我想了想，和这样一个爽快的人在一起也好。我说：

“好吧！我还没有问你的姓名呢！”

“姓周，名阿塞。”他说，“你们以后就叫我阿塞吧！”

颇有点传奇性的，从那天开始，他义务地做了我们的仆人，也做了我的好朋友。

× × ×

保山这个城市并不算大，但在当时是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据点。我和张希文先被分派到飞机场去担任和美军人员联络的工作。不到一个月，我们又被派到怒江第一线去做翻译。那时候，日本人的阵地就在怒江对面。怒

江这边驻有许多炮队。报纸上说，每天都有炮战。一听说这是到如此危险的地区，希文和我都面有难色。我们的佣人阿塞却高兴得跳了起来，他说：

“唐先生，到怒江边上比呆在机场听嗡嗡的机声要有味得多！”

希文懒洋洋地问他：“如何有味呢？”

“喝，你见过萨迷人吗？见过罗罗族吗？见过白夷吗？”

我们摇了摇头。

“我在怒江边上住过两年，喝，”他口沫横飞地像演说一般，“天底下，你不会找到比菩萨还要美丽的姑娘了！”

“什么菩萨呀？”马上引起了希文的兴趣。

“凡是没有出嫁的白夷姑娘，都叫菩萨。一个个长得比天仙还漂亮，来到滇西不看看白夷姑娘，我说呀，你们会后悔一辈子的！”

白夷姑娘的艳名，在昆明早已听说过。现在加上阿塞的极力怂恿，我们三个人背着小包袱翻山越岭，向怒江前线出发。

步行两天，始到达怒江前线。先前，我们都以为这里一定炮火连天，尸积如山；其实，对岸的日本大炮，早已被这边的优越炮火所制压，根本没有还炮的能力。前线上更没有敌机的影子。那时候日军已属强弩之末，只有挨打的分儿了。所以，离前线不到五里的长安街，繁华得竟像一个小城，什么杂货店，理发店，一应俱全，生意最好的当然是饭店。满街都是军人，挤来拥去地十